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缅甸经济政策与华商^{*}

范宏伟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暨南洋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东南亚; 缅甸; 金融危机; 经济政策; 华商发展

[摘要]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 缅甸政府为阻止经济恶化, 采取了推进农业改革、加速国有企业私营化步伐、拓宽融资渠道和加强边贸发展等措施, 为缅甸华商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机会, 华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而缅甸动荡的政治局势、缅甸经济改革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及中国新移民在缅甸的涌现, 是缅甸华商未来发展必须应对的问题。

[中图分类号] D634.3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7)03-0039-08

Myanmar's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Chinese Entrepreneur after the 1997 South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FAN Hong-wei

(Research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 Myanmar; financial crisis; economic policy; ethnic Chinese entrepreneur's development

Abstract: After the 1997 South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Myanmar's government took some measures to prevent economic deterioration by undertaking agricultural reform, accelerating privatization of state enterprise, widening financing channel and promoting border trade. They provided ethnic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Myanmar with som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s. Nevertheless, ethnic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Myanmar in the coming years have to face such problems as political instability, malpractices and drawbacks inherent in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influx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翻开当前众多有关东南亚以及华侨华人的研究著作, 我们会发现缅甸这一章经常会被自动地“省略”。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缅甸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使世人较难了解其国内的情况, 这种局面迄今也未得到完全改善。有关缅甸经济的研究正如亚洲发展银行的分析报告所言, “由于缺少资料, 客观评价缅甸的经济发展是一件困难的事情。”^[1]如果说资料的匮乏是研究缅甸经济的难点, 那么关于缅甸华商第一手资料的稀有, 则是目前缅甸华人经济研究较为薄弱的症结所在。

[收稿日期] 2007-06-19

[作者简介] 范宏伟, 男, 历史学博士,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讲师。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基金资助项目《东盟国家的工业化、科技进步与竞争力研究》(06JJD790028)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战后缅甸华商发展史回顾

1948年缅甸独立后，华侨经济随着缅甸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经历了诸多动荡和波折。

1948 - 1962年自由同盟执政时期，是战后缅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虽然这一时期缅甸政府实行的“商贸缅甸人优先”民族主义政策把一些华商资本从商业领域排挤出去，但该政策主要局限于有关进出口贸易的商贸领域，所以华侨经济总体上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而且缅甸当局在限制外侨在商业领域发展的时候，又鼓励外侨向工业领域发展。1956年，缅甸总理吴巴瑞向来访的周恩来表示，“华侨因缅府将当店等生意收归国有后，出现了游资，如果该游资投入缅甸工业，缅府是同意的，并加协助。”“缅甸政府希望华侨能把资本转入工业。”^[42]对此，中国政府不仅在政策上积极鼓励华侨由商转工，而且愿意在技术、设备上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以“引导和支持华侨由商业转向工业”。^[3]在上述背景下，缅甸华侨经济这一时期趋利避害，由商转工，实力有了较大的增长，华侨工业发展迅速。据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调查，50年代末期，华侨在缅甸香烟、饼干等行业占有统治地位，在肥皂、橡胶、针织产品市场具有重要地位。^[4]

1962 - 1988年奈温军人集团当政期间，是缅甸华商发展最为困难的时期。1962年3月，奈温军政府上台后，为建设“缅甸式社会主义”推行的一系列激进经济政策，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国有化对华商影响很大。在这次国有化运动中，缅华经济遭到沉重的打击。华侨华人的商号、企业、报社、学校被收归国有。华商在工业方面受打击较大的行业有碾米业、锯木业、针织业、塑料业、香烟业、糖果和罐头业等，在商业领域受打击较大的行业有土产、米业、进出口、五金、洋百货和白酒代理等。1964年，缅甸政府宣布面额100元和50元的钞票作废，这使得许多华侨华人不能在缅立足，被迫再次移民，留下的华商大部分只能在缅甸人没有能力经营的行业谋生。70年代初，私人相继被允许在橡胶园、制造业投资经营。1977年9月，缅甸当局颁布《私营企业权利法》，保证30年内不对私营企业实行国有化。这些政策的变化为缅甸华人经济的恢复初步奠定了基础，一些华人开始重操旧业，惨淡经营，逐步发展。

1988年新军人政府上台后，缅甸华商再度崛起。1988年9月，以苏貌为首的军人集团接管国家政权，宣布放弃奈温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些为华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和政策空间。据缅甸贸易部统计，1988年11月到1993年4月，全缅出口公司和代理商共5875家，华商约有800家，占14%。其中，经营木材出口的华商有60多家，年出口量约占缅甸私人木材出口量的15%；经营豆类出口的有40余家，年出口量占私商出口总量的70%；此外，在橡胶、农林及水产品出口方面，华商均占主导地位。因此，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数量虽然不多，但实力、经营规模在缅甸进出口贸易中具有相当的地位，缅甸最大的20家私营进出口公司，华商占50%。^[5]其他领域，这一阶段华商也取得了不错的发展。例如，到90年代中期缅甸国内主要市场的售货摊位70%为华人所经营，主要行业为米谷、土产、珠宝、塑料、机械、运输、旅馆、餐饮、纺织、建筑、旅游、农畜、水产等。^[6]缅甸大部分的零售业、批发业、包括边境的进口贸易和大饭店等，都是由华人或中缅混血儿经营，华人再度居于缅甸经济的前沿。^[7]

二、金融危机后的缅甸经济政策

（一）金融危机前后缅甸的经济形势

不容否认，20世纪90年代以后缅甸进行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1992年以后，1992/93年度至1995/96年度（缅甸财政年度自当年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的四年计划期间，增长幅度较大，年均增长率达8.2%”。^[8]但从1996年度开始，缅甸经济增长幅度不断下降，特别是1997/98年度缅甸经济陷入衰退。这主要是由于：前一阶段缅甸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促

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1996 年度起不得不紧缩财政支出；受“厄尔尼诺”气候的影响，1996 - 1998 年度缅甸农业生产下降；1997 年由于缅甸军政府没有如约交权给 1990 年大选中获胜的“全国民主联盟”，受到了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方面，缅甸所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内发的，而是间接的、外源性的，不是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由于自身的“泡沫经济”与不良债权问题引发的，基本是受到周边国家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的间接影响。据统计，1988 - 1999 年间缅甸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批准）71 亿美元，^[9]其中东盟是缅甸主要投资来源之一。但是，1997 年度缅甸吸引的外资急剧减少。据缅甸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96 年缅甸吸引外资 23 亿美元，1997 年为 12.56 亿美元，1998 年下降到 2.47 亿美元，^[10]1999 年共吸引外资 11 项，总额为 4955.3 万美元，仅及 1998 年吸引外资的零头，东盟国家对缅甸直接投资减少了 70%。^[11]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等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公司先后撤离缅甸。缅甸的“通货膨胀率由金融危机发生前的 16.2% 猛升到 29.5%。货币贬值超过 50%。”^[12]

（二）金融危机后缅甸的主要经济政策

为了消除上述一系列因素对缅甸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扭转缅甸经济下滑的趋势，金融危机后缅甸政府出台了一些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加大了经济改革的力度。

首先，推进农业改革，扩大与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放宽农产品的出口管制。从 1999 年 1 月开始，将大量荒地和沼泽地租赁给私人经营。免征农用物资进口税，扩大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容许农户与企业出口豆类、橡胶、糖、植物等经济作物，为此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较大幅度的扩大。其次，加速国有企业私营化步伐。将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租赁或拍卖给资金雄厚、技术力量强、经营管理好的私营企业经营。1999 年 10 月，缅甸政府决定向私营工业企业提供低息贷款，降低其纳税税率，大力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第三，鼓励国人生产和使用进口替代商品，提高奢侈品进口关税和征收外汇商业税等。第四，拓宽集资渠道。缅甸政府宣布，发行由政府担保的抵押债券、公司债券，或通过其他方式从国内外集资，解决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第五，进一步推动边境贸易发展，将其纳入正常贸易的途径。2000 年 11 月 13 日，缅甸经贸部发布第 5/1000 号命令，修改 1997 年 12 月 9 日通过的边境地区与邻国进行贸易时只允许以正常的贸易关系进行贸易的规定，允许在边境贸易中可利用以下方式进行交易：在中缅和印缅边境地区，如用人民币、缅币、卢比、美元出售出口的货物，即可相应用人民币、缅币、卢比、美元购买进口货物和缴付海关税。最后，积极参与多边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重视发展与亚洲近邻国家的经贸关系。1997 年 4 月缅甸加入东盟以后，除了参与东盟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以外，还参加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BCIM）、“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孟印缅斯泰经济合作组织”（BIMST-EC）。此外，还重视开拓与近邻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的经济合作与贸易，争取这些国家的投资与合作，以平衡欧美国家对其实施经济制裁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金融危机后的缅甸华商

（一）金融危机后缅甸华商的发展

缅甸政府为阻止经济恶化而采取的上述举措，对这一阶段缅甸华商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机会。20 世纪 90 年代初，经营进出口贸易的缅甸华商还只有 800 家，1997 年以后已增加到 4500 多家。杂货业历来是缅华经济的重要产业，据估计全缅现经营杂货业的有 2.5 万多家，每家资本约在 200 万缅元左右，多属家庭经营。^[13]近年来，缅甸的改革开放也为缅华的餐饮业带来了诸多商机。首先，由于缅甸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外出用餐者日渐增多。其次，到缅的旅游者、外商日益增多，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华商、港澳台的厂商前往者，“多安排在中餐馆用餐，侨营餐馆因应

市场需要乃多扩充。^[14]再次，随着缅华经济的发展，华人社团的经济基础也不断巩固，社团的许多仪式和活动往往安排在中餐馆举行。此外，缅华经济日趋活跃，商户之间的应酬活动较多。这些因素成为这一时期缅华餐饮业发展的驱动力。

缅甸华商在商业领域中的其他行业 1997 年后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2000 年左右，缅甸从事布匹和成衣生意的华商商户有 7000 多家，每家资本约 600 - 5000 万缅元不等；小食店仅仰光就有 2000 多家，每家资本在 100 - 200 万缅元之间；仰光茶室 700 余家，资本在 100 - 4000 万缅元之间不等；经营乐器、玩具的全缅华商有 200 家左右，资本在 100 - 3000 万缅元之间；华商经营的旅馆有 2000 多家，资本多在 500 万缅元上下；从事内河及沿海航运者有 700 多家，资本从 500 万缅元到 8000 万缅元不等。^[15]

由于金融危机后缅甸政府实行鼓励国民生产和使用进口替代商品，提高高档商品进口关税等政策，缅华工业根据市场需要也取得了一定发展，如表 1 所示。

表 1 缅华部分工业发展情况

单位：万缅元

年份 行业	1993 年		2000 年	
	企业数目	资本范围	企业数目	资本范围
食品加工业	4000 家	300 - 5000	5000 家	600 - 9000
纺织	400 (包括成衣) 家	500 - 4000	500 家	800 - 7000
化学	300 家	300 - 4000	400 家	600 - 7000
造纸	90 多家	-	100 多家	-
塑料制品	近 400 家	-	700 - 800 家	-

资料来源：华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华人经济年鉴 2000/2001》，北京：朝华出版社，2001 年，第 93 页；华侨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华侨经济年鉴》，台北：1993 年，第 82 - 83 页。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到 2000 年为止，缅甸华商经营食品加工、纺织、化学、造纸、塑料制品等工业，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拥有资本的最低和最高额都有明显的发展。缅华生产的这些工业产品正是 1999 年以后，缅甸政府极力鼓励缅甸国民投资和使用的。总之，1997 年以后缅甸华商的经济在 90 年代初复兴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

(二) 缅甸华商经济发展原因分析

首先，缅甸华商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缅甸坚持的经济改革和当局在经济上对华商的态度。1988 年新军人集团上台后，放弃“缅甸式社会主义”政策，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缅甸华商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不断发展的前提因素之一。此外，缅甸当局在经济领域并没有歧视和限制华商的发展，这是缅华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前提。1982 年，缅甸颁布的《缅甸民法》将公民划分为公民、客籍公民和归化公民三类。按照规定，华人只能是客籍公民和归化公民。华人作为二等和三等公民，没有被选举权，不能竞选公职和担任政府机构和团体的领导。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缅甸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则完全适用于全体华商，没有区别对待。特别是 1994 年 3 月 31 日缅甸政府颁布的《缅甸联邦公民投资法》明确规定，本民法所指公民“包括客籍公民与已加入缅籍者”。^[16]所以，华人经济作为缅甸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近些年来缅甸市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环境，没有同其他缅甸族群一样公平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证，华商是无法有今天的发展成绩的。笔者 2004 年在缅甸进行田野调查时，众多被访华商也都承认这一点。

其次，缅甸政府重视华商的作用。长期以来，缅甸民族资本的严重匮乏、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外资的撤离，使缅甸政府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愿望非常迫切。就缅甸国内

来说，目前能筹集资金的主要有两大群体：一是同银行系统有密切关系的高衔军官，一是利用世界华商网络的缅甸华人群体。^[17]1999年缅甸官方公布，自1988年底向外资开放后，缅甸共吸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71亿美元，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缅投资额都位居前十位，^[18]尤其新加坡还是缅甸最大的投资国。实际上，来自东盟的外资，华商资本占了很大比重，“大部分的外资都是通过华人遍及东南亚的网络进入缅甸的，”^[19]台湾地区的资本尤其如此。因为缅甸没有开放台湾企业对缅直接投资与贸易，台商的经贸活动需要经过第三国或以“转单”的形式进行间接贸易。华商资本在缅甸外资中的地位，使缅甸华人的经济地位得以凸现。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认为，“在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网络充当了信息桥，把不同界限和等级的人联系起来，个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获得许多有价值的信息。”^[20]缅甸当局意识到世界华商网络的这种作用，试图借助这种网络改变缺少发展资本的困境。“今天，缅甸华人似乎站在国家经济的前沿，现在许多的外来投资都是以华人的网络作为进入缅甸的管道。”^[21]

1988年8月5日，中缅签订边贸协定后，中缅边界开放，缅甸当局随后第一次在仰光召开以华人领袖、商人为主的座谈会，讨论外国到缅甸投资以及中缅关系和中缅边贸的发展等问题，试图发挥华人的桥梁作用。1993年5月，缅甸当局发布93年第5号公告，允许持缅甸护照出国定居并已取得外国国籍者，在一年内可以申请恢复缅甸国籍和回国定居。后又将这一规定的期限延长至1995年12月31日。2000年1月，缅甸驻香港总领事吴腊丹在首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会上介绍了缅甸的经济改革情况和投资环境，表示欢迎到缅甸投资并愿意提供帮助。

在缅甸华资中还有一些来源是从缅甸移居国外的华人，他们也是缅甸当局争取和重视的对象。1964年缅甸政府实行的国有化和1967年发生的“6.26”反华暴乱，导致大批华侨华人再移民。目前，他们分布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计30多万人。美国缅华同侨现有10多万人，泰国有4-5万人，澳门有2万余人，台湾有12万人。^[22]这部分人经过数十年的拼搏，大多已扎根当地并拥有相当的经济基础，但他们对缅甸仍充满了感情。2000年1月，他们专门成立了“世界缅华同侨联谊会”，“凡在缅甸出生或居住过的华侨、华人、归侨或其后裔及缅甸社团可成为会员”，宗旨是“为侨居国（地）和祖籍国的经济繁荣、团结互助、优势互补、共谋发展。”^[23]不仅如此，海外缅甸华人在缅甸还有许多亲戚和朋友，双方来往密切。他们或汇款资助缅甸亲朋，或合作投资设厂。例如，“澳门归侨经过几十年的拼打，建立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后，归侨资本开始向大陆和缅甸流动，在缅甸投资经营项目涉及酒店、旅游、针织、制衣、纸箱加工以及海产品等领域。”^[24]有学者对此指出，“国外缅甸人的汇款也有助于将当地人带入全球网络。近些年来，这些汇款与在缅甸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价值不相上下。”^[25]因此争取这部分在国外的缅甸人，对于缅甸的外资引进、改革开放也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华资的涌入、中缅经贸的迅速发展为缅甸华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机遇。缅甸华商在缅甸吸引外资中的媒介作用，使其受到政府的重视，同样这种华商网络也给缅甸华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商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缅甸虽然为建立市场经济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经济自由化与对外开放程度仍低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政府效率低下，有关贸易、企业发展的法令和法规朝令夕改，成为外资在缅甸发展的一大障碍。^[26]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在缺乏明确契约的环境中，社会关系可以使投资和其他经济交易成本降低，成功率提高。^[27]特别是像缅甸这样的国家，政治扑朔迷离，市场不规范，法制不健全，外商在缅甸投资相比东南亚其他国家有更大的风险。对此，有人建议国内企业：“缅甸华商网络实质是在缅甸华人华侨的人际关系网。其本身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对广大急欲进入缅甸市场的云南省中小企业来讲，缅甸华商无疑是一条捷径。”^[28]

在华资进入缅甸的过程中，有共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缅甸华人就自然成为外来华商的首选合

作对象。例如，2000年9月13日，北京丰台区经贸团（10家单位）访缅，就直接与缅甸华商团体和工商界人士联系，商谈投资合作事宜。9月14日，双方在仰光武帝庙大礼堂举行投资经贸座谈会，缅方参加座谈会的各方面代表有缅甸华商商会、福建同乡会、云南同乡会、广东公司、广东工商总会、福州三山同乡会、缅华妇女协会、台商商会、永靖华侨互助会、应和会馆、华中校友会、南中校友会及工商企业界知名人士19人。会议双方围绕技术转让、合作经营、设备投资、产品代理等项目进行商讨。^[29]

此外，近年来中缅边贸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缅华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缅甸华商经济地位的提升。1988年8月5日，中缅签订《边境贸易协定》，并于10月3日全面开放缅中边境贸易。中缅边贸随后迅速发展，到90年代中期，云南和缅甸的边境贸易10年内从每年的1500万美元左右增加到8亿美元左右。^[30]目前，中国是缅甸的最大边贸伙伴。

中缅边贸的发展尤其带动了缅甸北部的经济发展，也为上缅甸的华人带来了商机。1988年中缅开放边境贸易之后，“传统的中缅跨境贸易华人依靠原有的血缘、家族、地缘形成的贸易纽带迅速复活，原本不涉及跨界贸易的缅甸福建华人也纷纷到到边境城市瑞丽设立商号进行边境贸易”。^[31]位于缅甸中北部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云集众多华商，当地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到曼德勒来必须会说一口流利国语”。在边境投资的绝大多数是云南和福建籍商人，他们在缅甸城市中心地区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华人社会。^[32]

拥有世界华商网络背景和中缅边贸的迅速发展，使缅甸华商在缅甸吸引外资中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同样这种华商网络也给缅甸华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商机，提升了缅甸华商的经济地位。

四、缅甸华商面临的问题

1997年金融危机后，缅甸华人经济事业虽然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但我们也看到华商的发展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缅甸华商实际从1988年以后才真正起步，资本积累、管理经验以及和国际市场的接轨等都还十分不足，许多店、厂尚处于家庭经营的层次上，经济实力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商仍无法相比。

1990年以来，缅甸动荡的政治局势也给华商的未来发展注入了诸多变数。1990年5月，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胜，获得485个议席中的392个席位。但军政府违背诺言，坚持先制宪再交权。宪法迄今未制定出来，只是确立了起草宪法的一些原则。新宪法的制定不仅决定着缅甸今后的政治、经济发展走向与格局，而且更预示着缅甸华人政治、经济地位的升降。缅甸民主政治的曲折发展历程，使得华人在缅甸的发展环境充满了不确定因素。1990年以来缅甸华人处境的改善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政治层面仍囿于1982年公民法的限制，没有摆脱二等或三等公民的地位。华商经济地位的提高固然是其处境改善的重要表现，但从长远来看，没有平等的政治权益和相应的政治地位，华人经济事业的发展就缺乏根本的保障，这对华人这样一个外来移民族群尤其如此。

缅甸经济改革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也在制约着缅华经济的发展。“缅甸军政府还没有能够完全摆脱‘缅甸式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基本目标尚未完全明确，还未提出经济改革的基本框架、战略、方法和措施。”^[33]缅甸进行的经济改革还只是局部的和不全面的，市场经济的原则还没有在经济生活中得到全面贯彻，经济秩序也还没有完全正常化，黑市、走私等地下经济现象仍然大量存在。“缅甸政府官员素质不高，索贿情形非常普遍，不仅投资案件申请手续繁杂，而且时效差”。^[34]正如一位在缅甸投资的香港华商所说，“如果说来缅甸投资者因受西方集团的压力而退出的人有一个人的话，那么因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而退出的外国人就会有两三个人，甚至更多。”^[35]此外，缅甸电力、交通和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相关经济法规不健全、官定汇率过高、政策朝令夕改等不利因素都是缅甸经济发展的桎梏，也是不同程度制

约缅华经济发展的障碍。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近十余年来，华人是缅甸国内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群体之一，华商的发展以及一些新情况的出现也可能会给族群关系带来一些问题。针对近些年华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学者提出缅甸的中产阶级是华人。如果华人被认为控制了缅甸的经济，那么可能会发生排华。^[36]对此，还有缅族学者提出，“中国人对曼德勒和缅甸北部的控制，事实上是在重复殖民时期英国人殖民缅甸的经济后果。二者的区别在于，英国人通过武力手段，中国人利用缅甸对外开放政策的空子”。^[37]此外，上缅甸华人人口数量的增加、大量中国新移民的进入也引起了部分缅人及民族主义者的敌视和反感。还有人提出，1999年华人占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人口的30%，“过去只有第80大街是唐人街，现在几乎曼德勒都是唐人街了。”^[38]据非官方估计，曼德勒90年代初即有100万左右中国非法移民，他们大部分在黑市购买身份证而成为缅甸公民。“许多云南家庭跨过边境定居在缅甸北部。”^[39]“大量涌入的中国人正在改变缅甸北部的人口结构。这也引起了缅人对非法移民和军政府的日益不满。”^[40]

结语

缅甸华人经济作为当地经济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同缅甸的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缅甸华商在经历了自由同盟执政的十余年黄金时期后，在奈温军政府期间经济一落千丈。1988年，缅甸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为华人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末，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缅甸自身政治、经济问题的制约，缅甸经济持续下滑。缅政府为阻止经济恶化，采取的推进农业改革、加速国有企业私营化步伐、拓宽融资渠道、加强边贸发展等措施，在不同程度上给华商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机会。在缅甸华商活跃在缅甸经济发展前沿的同时，缅甸动荡的政治局势、缅甸经济改革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中国新移民在缅甸的涌现，也是他们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注释]

- [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0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82.
- [2] 《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同缅方领导人谈话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203 - 00019 - 02 (1)。
- [3] 《关于缅甸华侨与缅甸政府合营造纸厂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5 - 00339 - 07 (1)。
- [4]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领事部编：《仰光华侨经济调查》1958年10月15日，第4页。
- [5] 方雄普：《朱波散记》，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
- [6] 包鲁：《华人在缅甸》，《东南亚南亚信息》，1996年第18期，第23页。
- [7] Mya Than, *The Ethnic Chinese in Myanmar and Their Identity*,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 128.
- [8] 古龙驹：《试论缅甸的改革与发展》，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未刊），1998年，第19页。
- [9] Donald M. Seekins, *Burma in 1999: A Slim Hope*, *Asian Survey*, Vol. XL, No. 1, Jan/Feb 2000, p. 23.
- [10] 《缅甸大刀阔斧改革经济》，（仰光）《缅甸华报》1999年6月2日。
- [11] 《亚洲经济简讯四则》，《缅甸华报》2000年4月26日。
- [12] 《缅甸大刀阔斧改革经济》，《缅甸华报》1999年6月2日。
- [13] 华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华人经济年鉴2000/2001》，北京：朝华出版社，2001年，第92 - 93页。
- [14] 《华侨经济年鉴1999》，台北：“侨务委员会”，2000年，第93页。
- [15] 华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华人经济年鉴2000/2001》，北京：朝华出版社，2001年，第92 - 93页。
- [16] 《缅甸联邦公民投资法》，姜永仁编著：《对缅甸投资贸易研究与指南》，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01页。

- [17] David I. Steinberg, *Myanmar: The Anomalies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Asia Foundation Working Paper, No. 5, November 1997, p. 24.
- [18] 新声:《缅甸上半年吸引外资锐减》,《东南亚南亚信息》1999年第22期。
- [19] Mya Than, The Ethnic Chinese in Myanmar and Their Identity,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 128.
- [20] Nan Li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2.
- [21] Mya Than, The Ethnic Chinese in Myanmar and Their Identity,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 128.
- [22] 《欢聚彩云之南:第二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集锦》,昆明,2002年,第24页。
- [23] 澳门缅华互助会编:《波胞情:首届世界缅华同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暨联谊大会纪念特刊》,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2002年,第85-86页。
- [24] 林清风:《缅甸归侨在澳门》,《缅华社会研究》,澳门:澳门缅华互助会,1999年,第106页。
- [25] James F. Guyot, Burma in 1996: One Economy, Two Politics, *Asian Survey*, Vol. XXXVII, No. 2, February 1997, p. 190.
- [26] Khin Maung Kyi,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urma: A Vision and Strategy*, Stockholm: Olof Palme International Center, 2000, p. 111.
- [27] K. Arow, Gifts and Exchang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 1972, pp. 343-362.
- [28] 张文兵:《云南省中小企业拓展周边国家市场的策略研究:以缅甸为例》,云南大学硕士论文(未刊),2004年,第36页。
- [29] 《中国北京丰台区经贸团访缅》,《缅甸华报》2000年9月20日。
- [30] Bertil Lintner, Enter the Drag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2, 1994, p. 22.
- [31] 袁建伟:《缅甸华人跨国网络的人类学研究》,云南大学硕士论文(未刊),2005年,第22页。
- [32] Bertil Lintner, Enter the Drag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2, 1994, p. 22.
- [33] 和劲松:《当代缅甸军人政权研究(1962—2000)》,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未刊),2001年,第87页。
- [34] 刘卜慎:《经济制裁之政经分析:缅甸个案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8页。
- [35] 貌优巴:《投资者访问记》,《缅甸华报》2001年10月3日。
- [36] David I. Steinberg, *Myanmar: The Anomalies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Asia Foundation Working Paper, No. 5, November 1997, p. 24.
- [37] Mya Maung, On the Road to Mandalay: A Case Study of the Sinonization of Upper Burma, *Asian Survey*, Vol. XXXIV, No. 5, May 1994, p. 455.
- [38] The Nations: Myanmar: China's Shadow: A Growing Presence from Next Door Spurs A Rethinking in Yangon, *Asia Week*, May 28, 1999.
- [39] Mya Maung, On the Road to Mandalay: A Case Study of the Sinonization of Upper Burma, *Asian Survey*, Vol. XXXIV, No. 5, May 1994, p. 453.
- [40] The Nations: Myanmar: China's Shadow: A Growing Presence from Next Door Spurs A Rethinking in Yangon, *Asia Week*, May 28, 1999.